

王金栋 编著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略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092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略

王金栋 编著

(黑)新登字第5号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略

ZHONGGUO GUDAI JIAOYU SIXIANG SHILUE

王金栋 编著

责任编辑:丁一平

封面设计:安 滨

责任校对:平 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32·印张 5.5·字数 110千

1995年7月第1版·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16-2953-4/G·2286 定价:7.30元

前 言

教育思想是社会历史范畴内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对教育的要求，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指向意识，是和治国安邦以及国家办教育的根本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制约教育工作培养人的整个过程。由此，可知各个朝代的教育思想，都是通过批判、继承和汲取、概括自己朝代教育成就的基础上，来建树自己的教育思想，推动人类对教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我们研究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不是唯古是从，而是“古为今用”，并结合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形成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思想，来更好地“主动适应”、“主动服务”，以促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迅速向前发展。为此，这本《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略》，是供教育工作者和从事教学管理人员以及高师学生，作为学习、研究时的参考。

这本书的编写，是几年来教育研究和教学实践的结果。在编写过程中曾拟订编写提纲，征求省内外有关同志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照了前辈专家和同行的专著、论文并对资料尽可能地核实。在此我们敬表谢意。

由于成书仓促，水平所限，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欢迎批评指正。

编 著 者

1994 年 5 月 1 日

目 录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浅说.....	(1)
第一章 夏、商、西周时期的教育思想.....	(4)
第一节 夏代“尚武”、“商代“敬神”的教育思想.....	(5)
第二节 西周时代文武并重、“六艺”兼备的 教育思想	(10)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思想	(15)
第一节 春秋战国形成“百家”的社会条件	(15)
第二节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开展了教育职能的大辩论	(20)
第三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教育思想	(27)
第一节 秦代“以法为教”和重视礼义教化的教育思想	(27)
第二节 汉初“无为为体，儒墨为用”的“黄老”教育思想	(30)
第三节 汉朝“独尊儒术”的教育思想	(33)
第四节 三国时期“重才”、“崇儒”的教育思想.....	(39)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思想	(44)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想“大解放”和 教育“多思潮”的社会条件	(44)
第二节 魏晋时期玄学化的教育思想	(52)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颜氏家训》教育思想	(56)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教育思想	(64)
第一节	隋唐“尊崇儒术,兼重佛道”的教育思想	(65)
第二节	隋唐崇儒教育思想的科举和学校教育制度	(69)
第三节	五代时期崇儒、尊孔的教育思想	(75)
小 结		(76)
第六章	两宋时期的教育思想	(83)
第一节	理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及其形成的过程	(85)
第二节	理学的内容及其教育主张	(91)
第三节	宋朝反理学的教育思想	(99)
第七章	辽、金、元时期的教育思想	(110)
第一节	辽、金的“封建化”教育思想	(110)
第二节	元朝的“汉化”教育思想	(119)
第八章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教育思想	(128)
第一节	明朝尊经崇儒,以程朱理学为其教育的指导思想	(128)
第二节	清朝实行“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学实之” 的教育思想	(138)
第三节	清代初步民主思想的出现与反对理学的教育 思想	(149)
总结语		(161)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浅说

改革教育思想是《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和一切关心教育人士的迫切要求。因为各项教育改革都需要有正确的教育思想作指导,教育思想不端正,教育改革就难以奏效。因而当前应紧紧抓住深化改革的时机,对过去的教育思想认真研究和反思,以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教育思想是社会历史范畴内的一种意识形态,教育思想史是历史各个时期表现为理论形态的教育意识。教育思想体现人们对教育的认识、看法和主张,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对教育的要求,更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导向意识,是和治国安邦、革命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总之,教育思想反映了社会和国家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方向 and 任务,它制约着教育工作培养人的整个过程。

评价某一时期或某一种教育思想,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十分困难的工作。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要想全面、深刻和准确地把握好教育思想,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现象(包括教育制度、内容、原则、途径和方法),从中发现每个历史时期处于主导地位和与之相对立的教育思想以及对当时

教育所产生的作用。因此,在研究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教育时,切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要从历史的整体性观点出发来考察我国从古至今各个朝代的教育思想发展的历程。从而鉴别清楚哪些是正确的先进的,哪些是错误的落后的;哪些是陈腐的,哪些是并不陈腐至今仍然具有一定活力的思想,甚或在封建社会占主导的那一部分传统教育思想中,还可有批判、继承能为今天所用的合理的思想因素。因为事物都是遵循否定之否定的客观规律向前发展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就有一个继承性的问题。教育事业和教育思想中的继承性比其他社会科学都要多,范围也更为广,这是由教育这一社会现象的特点所决定的。就是说,人类在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中都要对青年一代进行教育,教育能为一切时代、一切社会服务。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其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是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教育本身并不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消亡而消亡,即使是体现教育性质的教育内容、制度和形式等方面,也有为不同社会、不同阶级共同服务的东西和因素。所以,教育是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上层建筑。由此,可知各个朝代的教育思想都是通过批判、继承,并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汲取和概括自己时代的文化教育成就,以建树自己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由此推动人类对教育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我们研究古代教育思想不是唯古是从、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古为今用”,通过研究我国历史土壤上的教育国情,并结合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形成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思想,更好地贯彻“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革命接班人和建设者，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迅速发展。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目的和宗旨。

我国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变迁、思想道德观念等都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可分为若干历史阶段。因此，这本教育思想发展史专著拟定分成八个时期，以断代史的体例来进行分析研究。即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西夏辽金元、明清。在朝代的衔接上力求处理好上承下启的发展变化关系，弄清每个朝代教育思想的渊源、由来和发展，并根据“经世致用”的原则，力图从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中整理出科学的、带有规律性的教育思想来。

第一章 夏、商、西周时期的教育思想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出现,中国历史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在这过渡之中,远在公元前二千多年以前夏部落最早就建立了夏朝,经过商朝到西周极盛时期大约有一千三百年之久(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8 世纪)都是奴隶制社会。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到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奴隶制的产生是随着私有制而来的,它促成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使教育最终从社会生产、生活的母体中独立出来。应该说从奴隶社会的开始,教育就变为一种专门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而学校教育则成为教育活动的主要形式。这是夏、商、西周教育有别于远古教育的主要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夏、商、西周才真正是我国教育的开创时期。

在奴隶制社会里,“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是夏、商、西周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它深刻影响奴隶社会的教育发展,故使军事教育、宗教教育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那时教育所教授的内容,不是刑法而是有关宗教、政治、伦理、军事教育、识学、学算方面的文化知识以及民生日用所需要的常识。奴隶社会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学在官府”,这是由于奴隶主阶级不仅占有物质生产资料,而且也垄断社会精神生产的产品。这种奴隶主占有制的具体方式,最终决定学校教育不可能有“私”的形式

出现。又加上那时社会尚无铁器生产工具,生产力十分低下,国家无力把教学所需的“书”和“器”(学习礼乐舞射所需的教具)扩散于民间。而奴隶社会教学所需用的书(称典、籍、策、简)皆为天子及命官们著述所作的“礼制”都为官府所保存,民间无力复制;同时,国家也无力供养一些不为官而专门施教的世儒。当时的社会分工,在脑力这个领域内尚未细化,“官与师”还未分离开来,非官无学,学与官府是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反映在教育制度上必然是“学在官府”和“政教合一”的办学方式。始终没有私学的地位,这是世界教育史上所罕见的。又由于奴隶主阶级是社会物质、精神生产的独占者,故只有他们才能专门享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这就一直影响着以后几千年的剥削和阶级社会,使教育有了阶级性和等级性,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也已成为阶级社会中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

我国奴隶社会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夏为初创时期(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商为发展时期(公元前 16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西周为全盛时期(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8 世纪)。其教育也大致与奴隶社会初创、发展、全盛这三个时期相适应。但在这三个时期中就教育思想来说,不仅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地方。

第一节 夏代“尚武”、商代“敬神”的教育思想

夏代学校教育古籍记载:《孟子·滕文公上》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又据《礼记·明堂位》记载:“序,夏后氏之序也”。古籍称夏后氏不是指氏族部落的名称,而是夏王朝建立

后的称谓。当时称夏后氏又多与商、周并称,即是夏、商、周三代的同义语。所以说:序是三代共有的学校。又据经典史料考证看:夏、商、周三代在时间上都有重叠,不仅是前后相接有继承关系的朝代,而且还一直有同时期的列国之间的关系。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的强弱浮沉,因此可以认为:“序、校、庠,学则三代共之”。不过那时的学校在开始的时候,往往不是纯粹的教育机关。原始氏族社会的教育,往往和生产劳动、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时的教育活动常常和政治活动混在一起。之后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才逐渐成为专门的教育机关。序、校、庠是什么样的学校呢?据《孟子》之叙乡学也。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盖教学字隐含二义:一为教育,一为宗教,校训为教,教学从孝,所以明夏代之教民。“序者射也”,有人从文字学角度对序进行过考释,认为“经传多作榭、序、大约榭即射的异构,序又是射、榭的简化字”。从文学发展的源流可以证实,军事教育是夏序的重要内容,夏代军体教育除以射为主外,还有“御”即驾驭战车的训练。《尚书·甘誓》有“御非其马之正”的字句,说明夏初已有了兵车,因而也有了这方面的教练活动。夏代学校教育所以重视武士的培养和兵车的教练,是由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的王朝,在它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还存在着正向国家转化的氏族部落,例如有扈氏等。夏王朝建立后,一直处在两种制度、两个阶级的斗争中。夏统治者一方面要依靠征伐掠夺战俘来充当奴隶;另一方面又依靠武力镇压奴隶反抗,及其不甘心沦为属国的其他氏族部落。故夏朝统治者是“夏道尊命”、“为政尚武”,其教育则注重习武,素有“夏后氏以射造士”之称。因

而，夏朝的教育思想是以“重戎尚武”为主要特征。

那时，“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这说明夏序除教射、御之外，还兼有养老敬老的教育。这本是原始社会的遗俗，那时养老之礼为燕礼，以升重坐饮，致醉为限，其礼为最轻。但到了夏代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把养老之礼为飨礼，要求“体荐而不食，爵盈而不饮，依尊卑而为献取数毕而已”。很显然尊卑等级的伦理观念，已成为夏代养老之礼。关于“校”的教育内容，据朱熹在注中释曰：“校，以教民为义”，又说：“伦，序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在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人伦而已”。看来，夏代校、序、庠是设在乡里，以教化为大务的场所。夏代在重视军事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以服务于它对内统治和对外征伐天下的目的。

商朝在当时是一个文明大国，成汤之世号称诸侯三千。在国家制度和农、牧业生产等方面都比夏代有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分工更细，青铜器的制作已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这时商代已有较成熟的文字（4500个），设立学校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使学校逐渐成为专门的教育机关。据古籍所载：“右学”、“瞽宗”可能是商代的大学，置“师”任教“觉民”，是施礼教化的场所。庠、序在前代的基础上，到商朝已发展成为专门的学校了。过去庠和序的分工一是养老、一是习射，而到商代这种分工已逐渐消除了。有的地方设庠、有的地方设序，其目的都是进行礼乐教育。在于“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商朝的学校教育在承接的基础上，为适应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充满了尊神和神秘宗教气氛，这是和前代教育的主要区别。殷代的神权

有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为主的祖先神；以土(社)、河、岳为主的自然神；以帝为代表的天神。居于神权崇拜显赫地位的是殷人的祖先神，天神是诸神之一，而不是诸神之长。整个商代的神权基本上呈三足鼎立之势，并未存在过统一的神灵。诚如孔子所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几乎无事不占，无事不卜。因此说：“殷人尊神”既是商代文化思想的特点，也是商代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商代的学校教育为什么“尊神”和崇尚宗教呢？商王朝没有像周代那样大规模的分封而进行统治，而是主要靠尊崇和祭祀尽量多的先祖神(包括全体先祖和子姓先祖神)来发展子姓部族的势力，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凝聚子姓部族的力量来巩固商王朝为首的在方国联盟中稳固的核心地位。因而殷人不仅尊崇王室的子姓先祖，同时也尊崇非王室的子姓先祖以至某些异姓的先祖，通过崇拜先祖神这一纽带，一是同祖同宗以更广泛地发展殷代方国的牢固联盟；二是祈求先祖神来保佑殷王和殷人，不降灾降祸。因为诸位先祖在殷人心目中曾是农作、田猎、畜牧等生产活动的能手，某些女姓先祖对生育之事也颇有经验。此外，殷人还向一些先祖祷告以禳除灾害，“御疾”、“疾齿”等。殷人对先祖祈求、祷告当然笼罩着愚昧、迷信的气氛，但却也含有某些对祖先生产、生活经验的追溯和回顾，它与后世纯属欺骗性质的巫婆神汉是不尽相同的。祖先崇拜在人类宗教信仰和衍变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原始蒙昧时期宗教信仰的主流是自然崇拜；而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祖先崇拜则占了主导地位，祖先崇拜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初步胜利。对祖先的顶礼膜拜实际上表现着对祖辈征服自然功绩的赞叹。殷人在祖先神

灵前的祷告声中,包含歌颂人类征服自然的高亢音符。殷人对自然神的崇拜,一是感谢自然的恩赐,二是畏惧自然的表现。因而对自然现象充满了神秘感,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认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皆同神,对日月星辰等天体也进行祭祀。但在殷代自然崇拜里,被隆重祭祀的不是主要作为自然物的神灵,而是对土地、河、山具有较为人格化的自然神,即土(社)、河(黄河)、岳(嵩山)。“土(社)”神的威灵可降雨止风,避灾免害,保佑年成,已有人世间统治权力的投影。岳和河在自然崇拜系统里具有更高的威望,卜辞中有不少“祈年于岳”和“告秋之河”之类的记载。这和《诗经·时迈》里“怀柔百神,及河乔岳”的情况是一致的。卜辞中有“河其令雨”、“祈于土(社)雨”,“祈雨于岳”,这都表明土(社)、河、岳神均有降雨的神力。自然崇拜是殷人的主要宗教信仰之一,表面看来充满了愚昧和迷信,而实际上凝聚着对自然现象精细的观察、思考和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在殷人的心目中,自然诸神是掌管阴晴圆缺、风雨云雾等自然变化的,涉及丰年欠收之事。而“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礼记·祭法》),因而殷人对于其所瞻仰所取财用的自然及其人格化的神,当然就得进行尊崇和祭祀了。关于商代天神(帝)严格说来也属于自然神的范畴。只有帝才是最主要的天神。过去人们对“帝”有偏高估计的倾向,但在殷人的眼目中“帝”只是诸神之一,而不是诸神之长。卜辞材料表明,帝能支配诸种气象,如“令雨”、“令风”、“令云”、“降旱”等,但这完全是帝的主动行为,而不是人们祈祷的结果,更不能对帝施加影响而改变气象。令风令雨的帝,实质上是自然之天。在殷人的观念中,帝

也具有干预某些社会生活的神力,如“降祸”、“降灾”、影响年成、保佑征伐等,但这也和支配气象的情况一样,也具有盲目性,并不存在后世那种“天人感应”的因素。“帝”实际是殷人在对天空中的崇拜衍变出来的。殷代的帝和土(社)、河、岳神灵一样,既有自然品格又具有某种人格。实质上是自然之天与人格化的神灵的混合体,是偏坐于商代神灵殿堂的一隅而已。正由于商代特别是前期,还没有出现至高无上的王权,所以在天上也就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商代政治结构是王权、方国联盟势力、族权等的联合体,与之相适应的神灵世界,理所当然地呈现着多元化的状态。综上所述,由于同商具有以上这三种神,其神灵已覆盖了当时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部生活的方方面面,故有殷人“祭不欲数,数则烦”的局面,致使商代的学校教育也离不开敬神事福的宗教活动。这是对夏道的否定,宗教在商代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教育便成了宗教的附庸。

第二节 西周文武并重、“六艺”兼备的教育思想

由于古籍文献中有关西周的传说颇多,其教育思想的记载也较为详细。西周经过夏、商两代,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日益发展,西周的教育就是在作为当时经济制度的井田制,具有政治专制特点的分封、宗法制和以尊卑为礼制的思想文化,日臻完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成了奴隶制学校教育的完整体制。西周的学校可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又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大学由周天子设立的有“学宫”或称